

科技与社会

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十次留学潮

姚蜀平

摘要 本文概述了从19世纪首次官派幼童留美,直到21世纪新生代留学的十次留学潮,历时140余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整个历程。19世纪中叶洋务运动起始的第一次官派幼童留美伴随着以器物(经济)变迁为主的现代化运动;其后第二次留欧潮已由经济变迁转向政治变迁;20世纪初带来了辛亥革命的第三次留学潮是数万人留日;而第四次庚款留美带来了文化变迁;带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留法勤工俭学为第五次留学潮,抗战前后留美留欧第六次留学潮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人力储备;五十年代留苏(第七次)和同阶段台湾大规模留美(第八次)为海峡两岸现代化提供了人力资源。改革开放后迎来的第九次留学潮和新世纪第十次留学潮是当代现代化主力。

关键词 中国 现代化 留学 归国潮 文化交流 变迁

1985年,我应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邀请,前往合肥做了“中国历次留学运动”的演讲,后来我在此基础上继续有关留学史研究,于八十年代末写出一部30万字书稿《中国百年留学史》,该书稿详尽记述了一百多年来伴随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十次留学潮。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未能付梓,书稿也已丢失。今逢千千万万国人跨洋过海留学全球之际,不免想起那部丢失的书稿及以往的研究,遂将手边一些发表过及未发表过的文字和演讲稿,整理综合成此文,按照历史踪迹,概述140多年中的十次留学潮及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愿以此文表达对历代留学先人的敬意和怀念,并对当今留学者致以期盼和祝福。

作者简介:姚蜀平,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协作研究员, Email:shuping_yao@yahoo.com。

由于原书稿丢失，手头数据和资料有限，索引颇不完善，仅以参考文献形式附于文后，盼谅解和指正。

引言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向往文明和追求进步是人类自发的本能。路程遥远，语言障碍及风俗隔阂，都不能阻止经商冒险和求学取宝的人们。而他们的往来，也把人类创造的文明，像撒播种子一样，带到异国他乡，变成了人类共同财富。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与外国的交往。元代以前，主要是通过古丝绸之路与中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友好往来。其中除了使臣、商人、探险家外，也有大量僧人。他们往来于漫长的古道，传递信息，交换物质和学习技艺。在此东西文化交流中，值得一提的是赴佛教发源地天竺（印度）取经的僧人，他们可称为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其中功绩显赫者，当推玄奘。

玄奘大约出生在公元600年，是唐代有名高僧。虽已“誉满京邑”，他仍不满足，仍不顾朝廷禁令，只身西去求经。通过千难万险，抵达印度，在当时印度最大、最壮丽的佛教寺院那烂陀寺苦读五经书，随后游学全印度，多次在印度当时盛行的宗教学术辩论中，舌战群僧，独占鳌头，可谓中华和尚威震印度。当玄奘认为西来取经的目的已经达到，准备携经回国时，鸠摩罗王以建造一百所寺院为代价挽留玄奘，但他不为所动，像当年决心西去求学一样决心回国。玄奘满载经书，翻山越岭，回到中原。他上书唐太宗：“访学，无顾身命。”唐太宗宽恕了违令的玄奘，并建造大雁塔，收藏他带回的经书。

玄奘取经历时17年，行程5万里，带回佛教经典650部。在他开设的“译场”里，翻译了佛经74部，计1333卷。而他所著的《大唐西域记》，更是详尽地介绍了西域、中亚、印度、巴基斯坦的历史、地理及社会情况，为后世留下一部信史。

与玄奘同时代的义净也曾带回梵语佛典400余部，他和玄奘、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四大译经家”。这些经书，不仅对中国的佛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还对中国的哲学、科学和文学以及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由于内部派系斗争及回教的传入，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竟逐渐衰退，到13世纪，几乎消亡。有幸的是，它已传入中国，进而传入日本及东南亚诸国，而避免失传的悲剧下场。这也是各国文化交流与留学活动的可贵成就。

在玄奘等人西去取经求学之时，出现了日本大量派遣留学生到中国的热潮。

当时日本正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当权贵族决心向封建盛世的唐朝学习。260年间,日本向中国派遣了17次遣唐使,其中13次有留学生及学问僧(以学佛为目的)同行。遣唐使人数高达四千余人,不过其中大量是水手,真正留学生不足五分之一,而留名史册的只有四、五百人。他们多数在中国留学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之久,有的老死中国;回去归途中,又有不少人葬身大海,但真正后来回到日本的那部分人,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改革,对促进日本封建制度的建立,都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留学本是有来有往的双向交流。

在玄奘赴印取经一千年后,中国出现了一些同样出于宗教动机,赴欧求学的人。明清之际,耶稣教传教士以学术先行、宗教殿后的方式进入中国。后来返回欧洲时,他们带去了一些中国学生。从1633年至1868年,留学欧洲留名史册的就有132人。他们多是随传教士到欧洲学习神学。所去国主要是意大利,特别是在那不勒斯开设的一个“圣家修院”(也叫“中国学院”或“文华书院”)求学。132人中有106名中国留学生毕业于该学院。该学院创办人马国贤曾在1707至1723年在中国布道,回去时就带走四名中国幼童。这些早期赴欧的留学生在外国逗留时间都很长,少则十多年,多达30余年,他们都有很好的拉丁文造诣。有位康姓学生,1740至1750年在巴黎求学十年,他用拉丁文写下二百多页的旅行游记。另一位留学生沈富崇1680至1694年在里斯本和罗马求学,1684年9月曾到法国见到法王路易十四。法国杂志介绍了这次会见,盛赞他的拉丁语;而沈富崇则向西方人出示孔子画像,介绍中国文化及社会情况。他们中的少数人,如随法国传教士到法国的杨德望及高类思,接触到神学以外的理学;法国国务院秘书长见到不同于一般学神学的中国学生,特请名师教他们物理、化学。他们与曾著有《中国问题集》和《富庶之生产及分配之考察》的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克有密切往来;高类思也曾用法文写过长达482页的报告,论及中国与中国文学、科学之起源。

可惜这期间留学欧洲的100多人回国后,多数终身只充当了传教士。他们中既没有出现像玄奘那样将大量经书带回中国,并译成中文的人;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声音。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应该归罪于满清王朝一向反对耶稣教在中国的传播,耶稣教之教义和中国社会也相差甚远。这些满腹经纶的留学生回国后,只能默默地传播宗教。但是我们看到,在漫长的中国闭关自守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像是黑暗中的几点星火,燃到了欧洲大陆,带去了古老的东方气息;他们虽不是英雄,也是留名史册的人。

一 容闳和 19 世纪留美幼童

人们习惯把容闳推为中国留学运动的鼻祖，也许看看他的成长经历，可以更好地解读他后来的作为和功德。容闳 1828 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自幼在香港美国人办的马礼逊学校念书。1847 年随他的传教士老师布朗到了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那是美国早期立国基地，自由之风和学术之风盛行。他先在孟松学校上中学，后来进了耶鲁大学，并于 1854 年毕业，成为第一个在美国著名大学毕业的中国人。这是容闳和早期赴欧的那些留学生不同之处，那些人主要身处神学院学神学，而容闳却毕业于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耶鲁大学。在美国八年里，容闳悟到：“西学可以使中国复兴、开明和强盛”，并立志“我所享受到教育权利，下一代的同胞也应该同样地享受”。容闳的一生都在努力实现他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尽管他在大学期间就加入了美籍，可是毕业后，为了实现他的理想，毅然回到中国。

回到中国的容闳发现报国无门，因为清廷并不知道什么是耶鲁、哈佛，他们只认状元、进士，可是容闳连秀才都不是。无奈中容闳竟寄希望于太平天国——毕竟他们禁鸦片，废除妇女缠脚。他幻想号称笃信基督教的洪秀全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复兴与希望。为了一探真情，他冒险与美国茶商来到太平军所辖金陵城，见到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提出军队、政府及教育三大改革建议。干王以战事频频为借口，婉拒容闳建议，却授予他太平军四等爵位，及一枚刻有“容闳”二字的印章。

当时清廷正因鸦片战争面临“陌生的技术”的入侵，对任何舶来物都抱以仇视和排斥态度，容闳在此刻归国，其不受欢迎可想而知。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圆明园化为灰烬，清廷才被迫面对现实。正如李鸿章在上书中所说：“……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伟，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容闳在上海拜见了上海道统丁日昌，首次提出他的留学计划。丁日昌道此计划需从长作计，而当前急需派人前往美国购买机器设备，容闳终有机会为国效劳，他为此又回到美国接洽购买机器之事。这充分反映了留学生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适宜的社会环境。这次以“开铁矿，制船炮”为中心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风潮下，容闳大胆向清朝政府提出“政府宜选派殷实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的留学计划，在丁日昌向曾国藩及李鸿章推荐之下，得到清廷批准。

我们注意到容闳的这个留学计划有几个特点:(1)这是首次官派留学生;(2)选派的是12—15岁的幼童;(3)留学国度明确为美国;(4)留学期限长达15年。这些特点都和容闳本人留学经历相关。当1872年开始遴选出国幼童时,县衙门前的清吏大声宣读文告:“大清政府拟选送十二至十五岁少年,前往花旗国,学习技艺,凡志愿前往者,须身家清白,聪颖灵秀;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十五年中,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想不到第一批30名学生竟然无法招满。原因是在当时风气未开的中国,许多家长惧怕“土番剥皮食人”,不敢让孩子报名。最后容闳只好亲自到香港、广州招募,凑满首批30人。一艘明轮船(Paddle Sheel)航行在风浪滔滔的太平洋,载着30个惊恐不安的中国少年奔赴大洋彼岸,他们就是中国首批官费留学生。

美国朝野又是怎样看待首批留美的中国学生呢?美国驻华公使劳(F. P. Low)先生1872年7月12日打电报给美国国务卿菲什(H. Fish):“如果我们人民能够给予(幼童)慷慨及友善的接待,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将有更大的实惠。远比增派我们的军舰来此为佳!”由于容闳学生时代是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美国东北部六个州)度过,他选择留美幼童的落脚地也是新英格兰地区。1872年10月1日,康州教育局长诺索布(Norththrop)指出:“有122个美国家庭愿意接待两名幼童,合计可接待244名;而是年抵达的中国幼童仅30名。”首批到达的幼童被分派住在麻省春田镇(Springfield)和康州哈德福(Hartford)一带的美国人家里。以后几年陆续有幼童抵达,至1875年,共有120名幼童出现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美国人家中。他们和主人的关系不是一般的房东和房客,而是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关系。因为首批幼童中最小的仅10岁,他们实在还是一群孩子。他们和监护人的孩子一起上学和生活,不仅语言进步快,连生活上也很快西化:

他们脱掉长衫,把辫子盘在头顶,和美国孩子一起骑车、划船,打垒球;

1876年全体幼童身着黑色西服参观了为纪念美国建国一百周年在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后称世界博览会),詹天佑惊喜地在冒烟的蒸汽火车上下跑窜;

耶鲁大学划船队舵手钟文耀指挥的船队,遥遥领先地战胜了哈佛大学船队;

梁诚成为菲利普学院垒球队投球好手,使校队连连获捷,他的照片被挂在校图书馆墙上;后来幼童还组织过一支颇有水平的“东方人”垒球队;

周日幼童与监护人一家同上课堂——而所有这一切都成了不祥的祸根。

1874年,中国政府耗资7.5万美元,在康州首府哈德福建造了一所楼房——“幼童出洋肄业局”,它既成为负责幼童留学事务的中国官员办公处所,也为幼童

前来进修中文所用。其地址是 352 Collins St. Hartford MA., 32 年前的 1983 年,我曾站在那个旧址对面遥想百年前的情景——1967 年它已经被拆除,无论是中国大陆政府或是台湾当局,都没有想过买下这栋有历史意义的楼房。容闳当时希望建了这栋楼房,清廷不会对留学计划半途而废;可惜他的愿望没有实现。幼童们迅速的“美国化”,引起了新来的清朝官员吴子登的不满,他向朝廷进谗言:“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飭,亦觉防范难固,极应将局裁撤。”19 世纪 80 年代,美国西部许多地方出现排华暴力事件,美国西点军校及海军军官学校也拒绝接收中国学生,而这些学校正是李鸿章希望中国学生能够深造之地,他不愿再为肄业局尽力了。在保守派的压力下,1881 年,清政府下令全体幼童尽速撤退返华。这不仅对一些刚刚进入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等著名大学的幼童们是沉重打击,也引起学生监护人及各个学校校长先生们的不满和关注。耶鲁大学校长泡特(Noah Porter)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许多教授、校长,及幼童监护人,还有作家马可·吐温均在上面签了名。马克·吐温就住在哈德福市,他受容闳好友杜吉尔牧师的委托,拜会了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适值格兰特将军访华,他特意晋见了李鸿章,提出应该让中国幼童完成学业。可惜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除了三人因缘留下,其余全部被遣送回国。

就在这群当年的幼童,此时的青年人,被迫从太平洋颠簸返国途中,《纽约时报》于 1881 年 7 月 23 日发表文章指出:“幼童们不需要变成革命者,或共和派,他们无意中吸收到的自由思想,使中国与其它欧洲文明国家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中国不可能只学习我们的科技及工业物质文明,而又不带回政治上的改革因素。那样,中国将会一无所得。”这群返国的留美幼童,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在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其它还有 60 多人已经进入大学或技术学校。其中梁崧生还有一年就要毕业,唐绍仪刚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完一年级,唐国安在耶鲁刚读完一年级,邝景阳在麻省理工学院刚读完一年级,丁崇吉在哈佛刚读完一年级,黄仲良在理海大学刚读完一年级,梁诚还在菲利普学院,更多幼童和他一样还在中学学习,如今他们统统被迫放弃学业返回中国。

这群被迫返国的留学生抵达上海后,像一群罪犯般被送到关闭已久、阴冷潮湿的求知书院。屋外站着一队持枪的士兵,不许他们外出。后来他们被随意分配到一些完全不考虑其特长的地方工作。其中 41 人被分配到海军,在不久的中法马尾海战中,詹天佑和其它 7 个归国留学生,都充当了“扬武号”上的枪炮官,

一个小时战斗下来,4个殉难。后来直到中日战争中国惨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朝方才想起这批早年赴美归国的留学生,当时他们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

除了我们熟悉的詹天佑以外,他们之中还有些令人瞩目的,如曾在袁世凯内阁中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另有2人曾任外交总长,3人任过驻外公使,12位任过外交官员,3人担任过铁路局长,6人任过铁路工程师,16人当过电报局官员,2人出任过海军元帅,14人当过海军军官……不可不提的是,那位曾经的垒球队投球好手梁诚在担任驻美公使时,为促使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立下了汗马功劳,当谈判对手知晓他的背景时,个个对他刮目相待;而另一位归国幼童唐国安则是首任清华大学校长。所有这些当年的留美幼童、后来的国家栋梁,都不可能忘却他们年幼时在太平洋彼岸的求学日子。他们始终保持了在新英格兰所受教育的精神——尚苦干,重纪律,惜荣誉,保持君子风度。正如1906年10月,已担当京张铁路总工程师的詹天佑,给当年他的老师诺索布夫人写信所说:

中国已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自己的铁路。

好像我成了中国最佳工程师,因此全体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密切地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也为其它中国工程师和所有中国人的不幸,因为中国工程师们将不会再被人们信赖!

在我受命此工作之前,即使出任之后,许多外国人公开宣称,中国工程师绝不可能担当如此艰巨的重任,因为要开山凿石,并且修建极长的隧道!

但我全力以赴,至今已修成一段。特附上剪报一份,使你知道,当年在威士海及在你监护下的一位中国幼童,现在已完成和将来继续要完成的任务……

1913年,詹天佑和其它不同时代归国的留学生,共同发起创建了欧美同学会,倡导“修学、游艺、敦谊、励行”。1924年,经首届欧美同学会会长、首批留美幼童、民初交通总长梁敦彦倡议,会员集资购买北京南河沿街口111号(当年的石靛子庙)作为同学会会所。它至今仍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保留。

容闳对他倡导的留学计划的夭折,更是伤心和困惑;他的余生都在美、中之间奔波,再无所获。48岁时他与一位美国女子结婚,十年后妻子病逝,留下两个孩子。1904年和1905年,维新派领军人物梁启超和康有为先生先后访美,都到过哈德福容闳宅邸拜谒。1912年,容闳弥留之际,收到孙中山先生给他的来信:“腐朽无能的清廷已归覆灭,请老先生归国共商国民大计。”第二天他就撒手人寰。他被葬在哈德福市郊的公墓里。我曾于1983年前往,偌大的墓地,唯我



图1. 姚蜀平在容闳墓旁（摄于1983年）

一人形单影只地站在那里凭吊；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墓碑面朝东方……

诸位留美学者或旅游者如果前往美国东部，不妨去拜谒这位留学生的开山鼻祖，那是哈德福市郊雪松山公墓（Cedar Hill Cemetery）。碑座正面刻有一英文“Yung”，下绘一中式“容”字图案。1972年，墓前新立一座台湾教育部长蒋彦士赠的大理石纪念碑。墓地庞大难寻，注意第十墓区东北部，编号21墓位即是。

二 严复及19世纪末留欧活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不得不面现实。1865年6月25日，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建设立船政学堂，分制造和驾驶两部分，并请法国人日意格为监督。五年内造船三艘，兵轮二十艘。后经李鸿章允准，决定派学生留学英、法，专门学习驾驶和造船。这次留学真正是为了“船坚炮利”而去。第一批赴英法留学的5名学生于留美幼童出发的最后一年——1875年启程。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学会一种技艺，无暇求学。第二年又有7人前往，随后十余年中，陆续派遣了88名留学欧洲的学生。如果把这些留欧学生和较他们稍早一点的留美学生做一比较，大致可以看出下列特点：

(1) 留欧学生岁数比留美幼童大。他们出国时都已二十多岁；(2) 留欧学生基础比较厚实，他们都从福州船政学堂或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有很好的英文和科学基础；(3) 留欧学生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学习一门技艺，如造船、驾驶及火药、造枪炮等；(4) 分派时间拖得长，常是相隔4至5年才派一批；(5) 留学期限短。这些留学生目的单为学习一门技艺，所学时间从两、三年到五、六年不等；学成就回来。(6) 留学生所去国，有英国、法国和德国。

这批留欧学生中，31人学造船、布雷、炸药制造，26人学航海，12人学国际法，还有些人当工艺学徒。回国后，多数人当教员或到海军服务。如他们中学驾驶的刘步蟾、邓世昌和萨镇冰回来后加入北洋水师，后来都成了海军的领军人物。在此留欧学生中，竟也出现当年的留美幼童，如吴仰曾。他是1872年第一批留美

幼童，出国时年方11。1881年被清廷召回国时，刚刚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被分配到唐山煤矿。直到1886年，李鸿章将他送到英国皇家矿业学校，至1890年毕业，回国后曾在多个煤矿、铜矿任总工程师或局长。1900年八国联军之乱时，他正在开平煤矿任副局长及主任验矿师。他组织“自卫队”多次防止“拳民”及俄国军队骚扰，确保给天津供煤不断。

这批人数不多的留欧学生，之所以会在中国留学史上留下他们的独特声音，主要原因是他们中出了一个佼佼者——严复。1854年出生的严复，13岁曾在数百人中以第一名成绩考进福州船政学堂，他在那里苦读五年书，不仅打下深厚的科学基础，英语更是成绩突出；毕业后又在“扬武号”军舰上实习了五年。1877年出国时，他已经23岁，心智都很成熟。这就为他日后到了英国，能独立思考，选择自己独特道路打下基础。到英国后，他幸运地没有被送去学驾驶，而是初在朴茨茅斯学院，后来又到格林威治学院学习，不仅学数学、物理、建筑，还学海军战术和公法等课程。在学习期间，他大量涉猎西方哲学、政治、经济乃至法律和社会学的西方名著；开始思考“英国为何富强，中国为何落后”之类问题。在群览博书的同时，他还走进法庭听诉讼，走进议院听辩论，到工厂、学校、医院、博物馆接触各阶层的人。他终于悟到西方的富强不在“船坚炮利”，而在于学术及行政上的进步。他把自己的救国计划定位在翻译西方著作，介绍西方思想上。

1859年，达尔文发表的《物种起源》风靡全英国乃至西方世界。严复到英国后，读了这本书和达尔文的其它著作。他开始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何屡战屡败，中国人会不会遭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厄运？回国以后，严复先后撰写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翻译了《原富》、《法意》、《天演论》及《群集权界论》等著作，介绍达尔文、斯宾塞、孟德斯鸠、密尔等人的思想，这对闭塞的中国人民认识西方文化及启发民智，都起了重大作用。1895年甲午海战惨败后，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抨击时政，介绍西学，宣传救国图存的维新变革思想，一时洛阳纸贵。事实上，严复的译作影响了几代人。光绪皇帝看了他的译作，接见过他45分钟；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称他为“中国西学第一人”，就连新文化的领军人物胡适也是因为接受了“适者生存”观点，而改名为“适”，并称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的熟语和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维新运动可以看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二阶段，它已经由经济变迁向政治变迁推进；而严复在其中的推波助澜作用，是当年派遣留欧学生的清廷始料不及

的。严复晚年思想渐趋保守，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对西方文明失望，开始转变立场，对中国翻天覆地的变革不表乐观，认为文化改革应先于政治变革。他和容闳恰恰相反。容闳年轻时期盼用教育救国，碰壁以后，晚年向维新乃至革命转变，严复却是年轻时全力推行维新，晚年心灰意冷，转而寄望于教育救国。他们两人都独特的经历和追求，都做了他们觉得该做的事，也做到了那个时代能做到的最好程度。他们都是留学生的楷模，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先辈。

三 20 世纪初留日高潮及辛亥革命

1894 年，甲午海战清廷惨败，这不仅打击了顽固派，也打击了苦心经营的洋务派；更重要的是，它刺激了广大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众，要求民族自强的呼声日益高涨。通过明治维新显示了强大国力的日本，无论对爱国青年，还是对腐败的清廷，变得有相当的吸引力。1896 年，中国首次派出 13 名官费留日学生。1904 年，中国举行最后一次科举会试，无论录取进士与否，一律送到日本留学。1901 年至 1906 年间，留日学生达万人之众，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其中有政府官费留学生，有地方出资公派留学生，也有相当数量的自费生。留学日本比起留学欧美要来得晚，却后来者居上，大大超过了 19 世纪的留美留欧学生总数。究其原因，一是和中国时代变迁及政府提倡有关，再者日本政府在和中国交战又签订《马关条约》后，一心想向中国示好，做出中日亲善的姿态。其中就包括为中国留日学生提供若干方便，如 1902 年建立的弘文书院，相当中国留学生的预备学堂，其内容含物理、法律、政治和师范教育；最后实事求是地说，留日确实具有留美和留欧不具备的许多有利条件——路近、文同、时短，费用低和手续简便。

在 20 世纪最初的那十年里，络绎不绝前往日本留学的中国官费生和自费学生总数达几万人，东京几乎成了中国留学生中心。这些留学生可分成下列几类：

(1) 速成生。分师范和政法两种，占留日学生的 60%；

(2) 普通生。相当日本中小学程度，占留日学生的 30%；

(3) 陆军生。他们多数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接受初级教育。民国以后我国的军界人士，多数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第 1 期至第 30 期，共有 676 名中国留学生毕业；其中仅第 6 期就有 198 人。蒋介石是第 10 期毕业生；

(4) 海军生。这类学生最少，因为日本根本不愿意为中国培养海军人才。

1906至1909年,在商船学校入读的共有135人,最终只有8人毕业。

(5) 特约生。这些学生是准备进入日本高等学院求学的,自1907年起,每年有165名,实际上,留学生中进入专门学校的只占留日学生总数的3—4%,而真正进入大学的,只占留日学生的1%。

清政府对留日学生寄予很大希望,盼望能够培养一批批维持和挽救他们命运的人,但事与愿违。当时许多维新派人士都亡命日本,如康、梁等人,他们对怀抱救国大志、出洋寻找改造中国道路的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颇有影响。而这些初出国门的年轻人来到日本后,不仅看到了一个现代化成功的范例,也看到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模式。他们在这里还能看到许多国内看不到的西方各流派的理论书籍,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最早流入中国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部分章节,都是通过这条留日归国渠道而传入中国的。不仅维新人物在日本,许多热衷革命的人也聚在日本,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的大半生涯是在西方文化环境下度过的。他在香港和檀香山受的教育,后又考查过欧洲诸国,最后在日本逗留时间最长。另一位领导人黄兴则是1902年被湖北当局送到日本学师范,1902—1903年就读于弘文书院;在求学的同时,他特别热衷于观看日本士官联队的操练。回国后,边教书,边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创立华兴会,该会30多名积极分子,几乎都有留日背景。以后在日本的革命党人联合成立了同盟会,成为反清主力军。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到此已进入第三阶段,即政治变迁的关键一步——由改革进入革命,最终推翻了中国数千年帝王专制,而留日学生在这一重要政治变迁中,又一次起了关键作用。

另外共产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董必武、彭湃、林伯渠、李汉俊、吴玉章、邓子恢等,也都是那个时期的留日学生;其中彭湃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许多后来广为人知,也对中国转型进步起到重要作用的名流要人,如鲁迅、郭沫若等,也都是那个时代的留日学生。

对少数从日本专科及高等院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在此以李四光为代表略表一二。李四光于1904年在他家乡湖北被选中,地方官费送往日本留学,时年仅15岁。1904至1907年他在弘文书院,学习语言和基础数理化学;1907年进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泊用机关科,专攻造船。在日本期间,李四光不仅虚心求学,也为四周爱国热潮激励,他参加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岁数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扬他人小有志气,还送了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勉励他。1910年他学成归国,次年辛亥革命成功,他曾在湖北军政府任实业部长。遗憾的是中国政局多变,袁

世凯出任总统后，对革命党人不信任，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李四光感到失落又失望，辞掉官职，再次出国深造，那是1913年7月。他第二次由政府公派留学，前往英国学采矿，后来转为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在欧洲做了一年多的考察，于1920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四 清华学堂及庚款留美

自从清政府1901年颁布《学堂章程》，国内出现一股留学热。在留日运动方兴未艾之际，留欧学生也日益增多，就连小国比利时当时都有300多名中国留学生。而最早接纳中国留学生的美国，除了由北洋政府派送的个别留学生之外，很少有中国留学生出现。那是因为1882年美国开始实行“排华法”，规定所有华人十年内一律不准进入美国，1892年延期十年，1902年期满后，又被总统批准延期十年，1904年，干脆宣布《排华法》无限期延长。这也是中国留学生转向日本和欧洲的重要原因。

20世纪初，中国义和团运动及随之发生的“庚子事变”，使中国政府被迫和11个国家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中国政府将向各国赔偿4.5亿两白银，分39年偿还，连本带利共达9.8亿两白银，这就是“庚子赔款”。这种连惩罚加欺凌的条约本来就不公平，这笔巨款更成为加在百姓头上的重担，引起民怨冲天。

美国方面也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譬如当时一手承办美国索赔事宜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他在1902年表示“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此话竟在《纽约时报》上公开登载；而那一年，恰好由梁诚出任驻美公使。梁诚又名梁震东、梁丕旭，是上世纪第四批留美幼童，1875年出国时年仅12岁，1881年被清廷召回国时，正在麻州安德福（Andover）著名的菲利普学院（Phillips Academy）——一所全美名列前茅的私立寄宿高中学习。1902年他到美国上任后，即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榷谈庚款问题：强调赔款数额之巨，导致民间负荷过重，仇洋民意高涨，既然美国也感赔偿金额实属过高，何不由美国倡议核减赔款。并且预言“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此事促成多经波折，其中美国传教士明恩博之从中斡旋，美国有识之士之“中国留学大军已远离美国”的叹息，都起了作用。我们不妨看一看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E.J.James）1906年给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

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35年

前就成就这件事(一度看来似乎有可能),把中国学生的留学潮流引向美国,并不断扩大这个潮流,那么,我们今天通过对中国领袖们知识上及精神上的支配,就该在各方面精心安排下,最得心应手地控制中国的发展了——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

中国事实上已派出成千上万青年出国留学……这意味着,这些中国人从欧洲回去后,他们将劝告中国仿效欧洲而不是美国;将推荐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教师和工程师到中国去……这意味着,他们将购买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货物而不买美国货,各种工业上的特许权将给予欧洲,而不是美国……

美国总统罗斯福1907年12月2日发布咨文,要求国会授权退还庚款多余部分给中国作教育之用,派留学生来美为其方式之一。这个提案在参议院顺利通过。

美国政府决定把庚款多余部分退还给中国,并指定作为教育,特别是留美之用,在中国引起极大反响。1908年朝廷拟定《派遣留学生规定》;1909年成立“游美学务处和肄业馆”,随之而来的是全国范围的甄别和考选。1909年,603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汇集北京,这是自从废除科举考试以来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考选。前后八天的考试,内容涵盖新学和旧学,既考国学、英文、本国史地,也考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历史及地理。最后被录取的有47人。由于这批录取的学生水平已达到入学美国大学程度,当年10月就被送到美国,入读多所著名大学。1910年又举办了第二次全国选考。其考试内容更是除了国文、英文及自然科学诸多科目外,还涵盖了希腊史、罗马史、英国史及拉丁文、德文、法文等科目。最后录取了70名。次年第三次考选,录取了63名。前后三期共录取180名,他们被后人称之为“甄别生”或“史前生”。因为他们都是直接送到美国留学,不像后来庚款留学都要先在“游学肄业馆”(后来改为“清华学堂”)进行补习准备。清华学堂在辛亥革命后改为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是19世纪第二批留美幼童。以后每年清华学堂毕业生全部资送留美。从1911年至1929年,留美预备部共派送学生1279人。我们可以看到庚款留美有下面几个特点:

(1) 由于在全国范围甄选,录取的学生素质都很高,他们年龄大多在17至20岁,到美国后都是直接进入一流高等院校,归国时也备受重用。和早年留美幼童比较,选择年龄稍长,有一定英文和科学根底的人留学,收效更大,这也是留学政策在摸索中的进步;

(2) 由于庚款充裕,这批留学生的待遇是之前和之后官费留学生中少有的,因此他们都可以安心读书。后来英国、法国也仿效美国归还部分庚款用于派遣留

学生，但是条件都不如美国优厚，

(3) 由于这是美国政府建议、中国政府响应并支持的，因此即使在《排华法》没有解除的年月里，这些留学生也没有受到无论是身份还是待遇的歧视；但是他们学成也必须回国，因为那块土地不容他们长期安身；

(4) 这批留学生及其以后的历届庚款留学生中的佼佼者比比皆是，在此不一一列举。这里既有时势造英雄的历史客观因素，其主观努力也不容忽视。这批留学生多数是靠自己的本事考上的，不少人家境贫寒，生活坎坷，可是他们赶上了这个机会，并且用自己的实力给我们留下了奋发图强成功的范例；

(5) 这是中美双方都寄予厚望的一代留学生。他们被两国政府所关注，也为两国人民所注目。美国这么做有他自身的目的和打算；而另一方，尽管留学生欣然前往，可是他们心中对庚款背景的屈辱之情，仍难以抹去，这是美国政要人士所无法估量也无法理解的。留学生不仅努力向学，他们身处的这个自由民主天地，更触发他们对自己国家前途的关切；他们远非詹姆斯先生想象的那样，轻易拱手送出自己的精神支配权。1915年部分庚款留美学生在康奈尔大学创建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旨在摆脱“学术荒芜之国”，并致力于立足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与此同时，留日归国的陈独秀在上海也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提出“以科学与人权并进”；1919年更是提出“拥护德赛两先生”，概括了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两股改造中国的潮流汇拢成意想不到的对社会的冲击力。

新文化运动可以看作中国现代化的第四阶段，它已经深入到文化思想层次，直接冲击了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留美、留日和其它归国留学生，和国内各阶层的开明人士一起，举起了现代化最为艰辛的一面旗帜，那是涉及到观念、意识、价值和行为方方面面的文化变迁。日本人早在一千年前就学习唐朝汉文化，他们对接受外国文化的羁绊远没有中国来得强烈。这种被现代化研究专家冷纳称之为“人格系统”的调整要有“心灵流动”的“移情能力”，对固步自封的中国人是最难的了。直到今天，这个任务仍然没有完成，还需有志之士为之努力。

庚款留学生对中国现代教育及科学的发展功不可没。归国之后，他们逐渐在各个大学取代外国人成为行政领导和教学骨干，并建立了许多国内以前没有的新学科。他们还组建了以留美归国留学生为主的“中央研究院”（1928年）和以留欧归国留学生为主的“北平研究院”（1929年）；1950年新中国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即以该两院为主体，早期学部委员（后称院士）更有许多是这个时期的留学生。

这批归国留学生为在中国建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学科、培养新型人才及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五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及无产阶级革命

1904年中国废除了科举制度，可是直到满清王朝被推翻，全国也只有三所讲授新学的国立高等学校，除此之外就是教会学校和一些专门学校，根本不可能满足广大青年的求学愿望。庚款留美3年仅选中180人，对成千上万的求学者来说，那是遥不可及；尤其是一些有志而贫穷的青年，不可能具备那么完善的知识基础，他们真是求学无路，升学无门。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智闭塞，中国陷入知识荒芜状态。那时便有中国有识之士提出：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阶级职业，最好能多多出洋，能读书求学的固好，便是跑一跑，见识见识，开开眼界，都有好处。

1912年，李石曾和吴稚晖在北京成立“留法俭学会”，宗旨是“纳最俭之费，求达留学之目的”。这里要指出，李石曾是1902年公费留法生，他一生都在致力于让中国工人知识化、让青年学生劳动化的人文主义。民国初年，鉴于有志西去求学青年经济困难，蔡元培、吴玉章又于1915年联合了李石曾和吴稚晖，创办了“勤工俭学会”，提出“劝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智识”。上面提及的四个人都有留法背景，他们后来还与法国友人联合成立了“法华教育会”，强调“近世之文化，以欧洲为泉源；欧洲之文化，以法国为先驱……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不过无论是俭学会还是教育会，都只是文化发展及交流的事业机构，并无基金或财务背景支持。他们可以宣传号召，甚至办预备补习班，协助办理出国手续，但是他们并无财力、无任何基金可以支持出国留学学子。这是和庚款留学最大的不同，也是后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矛盾重重、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有14万华工被招募到欧洲战场（实际更多），李石曾等人见如此许多农民出身的华工，来法数年，尚有诸多收获；更何况有相当基础的学生，来法勤工俭学又有何不可！遂在北京建立留法俭学会预备班，专习法文，一年分两次送往法国求学。所谓俭学生，是不做工专念书的，他们各自筹措留学经费。四川远处内地，交通闭塞，有志青年欲求学，更是难上加难，一旦听说能到法国半工半读或先工后读，莫不跃跃欲试。成都（1918年）、重庆（1919年）先后办起了留法预备学校。地方当局也极力支持，对毕业考试的优秀者，

给予 400 元津贴。四川省后来共有留法勤工俭学生 492 人,几占总人数三分之一。

1918 年 11 月一次大战结束,国内一些在预备班有所准备的人,开始由上海向法国马赛航行了。自 1919 年 3 月第一批 3 人,随后 5 月第二批 90 人赴法,以后每个月开往马赛的海轮,都载有几十上百个赴法求学的人。到 1920 年,赴法者已达 1700 多人。可惜他们来的不是时候——法国一战曾是主战场,1918 年 11 月大战才结束。当大量男女老幼拥入他们想象中的世外桃源时,看到的却是一个战后尚未恢复的荒芜、衰落、贫困又残败的法国,有的留学生甚至感叹道:“巴黎还不如上海!”

这里必须正视两个问题。

其一,不要忽略这里有个时段错位问题。李石曾看见十多万华工在法国时的种种遐想并没有错,那时法国急需劳动力,男子都从工厂和农村奔向战场,他们的岗位必须有人填补;十多万华工并不嫌多;可那是前几年的状况。现在是战后,老子说过“大军之后,必有凶年”——1919 年冬天的法国,开始出现经济衰退、法郎贬值,物价飞涨;勤工俭学生大量抵达的 1920 年,并不缺劳工。

其二,华工是英、法召募来的,合同上讲得明明白白,他们不仅生活全包,每月还有工钱和养家费。可是李石曾他们设想的留学计划中,留学经费或是自己筹措(俭学生),或是半工半读、先工后读(勤工俭学生);一旦无工可做,养活不了自己何以读书!这样的事情还真的发生了。1921 年初,来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已达 1800 多人,恰值法国经济最糟糕的时期,法国工人自己还找不到工做,或被裁员;这么多外国人来到一个经济日益恶化的陌生社会,怎么和法国工人竞争?

现实确实是残酷的,当一千多位满腔热情的学子来到法国,他们看到的完全不是当初想象的法国。工厂紧缩和倒闭,找工极难;幸运的人顶了回国华工的位子,才勉强算有份工钱可糊口。他们中少数人有家乡地方支持,或有其它途径,带来一定款项,尚可维持;而大多数人竟陷入生活困境,更无从求学读书。四川学生周光炜写了一首中法文混唱的《散工曲》,广泛流传在当时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中:

作工苦,作工苦,最苦莫过“马老五”(散工)。

舍尖(法文 Chef,工头)光喊“郎德努”(法文 non de dieu,非上帝族类,带讥讽意思),

加涅(法文 gagner,挣得)不过“德桑苏”(法文 deux-cent rou,二百个小钱,即十个法郎)。

法华教育会此时已经完全无能为力,极力撇清自己并无经济上的责任,只是精神之援助,引起学生的愤怒。新建的里昂中法大学是以庚款为基金,但它并不是为打着勤工俭学旗号来法国的这批学生准备的。此后生出许多的事端来——从反饥饿运动,反对中法借款,到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斗争,甚至出现了几起学生自杀和一起枪击驻法公使事件。后来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108名留学生被认为是“暴徒”而强行送回国。一场轰轰烈烈的勤工俭学运动走到这个地步,自然引起各方的关注。

把千里迢迢来法求学的中国学生强行送回国,这绝不是法国政府的初衷,况且国际影响也不好。于是,法国外交部、教育部都出面阻止,故仅遣送两批学生回国后就停止了。政府和各方都在设法解决这一千多留法学生的现实问题。

中国国内对此结果也感吃惊。四川省政府规定各县教育局需给留法勤工俭学生筹集贷款;学生家长也多方筹措。自1922年起,法国经济开始好转,国内外也都有人伸出援助之手;凡志愿求学者,陆续投考各类学校,迈进技校或大学读书去了。其后仅四川勤工俭学生就有二百多人毕业于各类学校。他们有在技校学习造纸、冶金、采矿、电机、建筑、纺织的,也有在巴黎大学及郎锡大学等高等院校学习哲学、文学、天文、数理、化学、医学及航空等的,还有一些人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或工程师、副工程师头衔。抗战时,全国八个航空修配厂中,有六位厂长是留法生。

还有一类人,自此不再热衷读书,而是倾心投入革命了。事实上,当初来时,就有人怀抱这方面的志向。如1920年2月蔡和森抱着“走遍各州,通其语言,读其书报,察其情势”的目的赴法;同年11月赴法的周恩来,因有经济后盾,更是专注于研究革命理论。他们此时看到的是经过残酷大战之后破败的法国,并且根据这个观察结果,认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趋没落。他们身在自由的法国,又可以看到各类书报杂志,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等革命学说,同时也可以更多地了解十月革命后苏俄正在发生的事情;于是这批人,转向一个看来颇有吸引力的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1921年冬,在巴黎出现“社会主义青年团”(Socialist Youth Corps),1922年7月,顺应国内中共成立而改名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到1923年,旅欧支部的共产党员的人数竟然超过了同期国内共产党员的总数。他们中的优秀者,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中坚力量。我们不妨看看这些人当初在他们自办的《旅欧周刊》上,是怎样定位自己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暂不论思想、学识如何,专就形式与精神而论,确是中国未来的劳动阶级的中心

人物。”他们还把自己和享有优厚官费待遇的庚款留美学生作对比：“留美的自然容易求得专门知识，留法学生的重要责任，不在求得高深知识，而在训练一种专门技艺或研究一种改革方法……请看他日国中，竟是谁的世界。”三十年后，当五星红旗升起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新中国领导人中，当年留法勤工俭学生大有人在，他们是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蔡畅及何长工等。而留美归来的那些有了专门知识的学者们，都成了他们忠实的子民；不过不容置疑的是，他们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六 抗战前后留学潮及五十年代归国潮

尽管社会动乱，战争频繁，中国留学热在二十到四十年代并没有低落下去。这里除了少数是各省官费，及教会学校（如燕京大学等）派遣，主要还是庚款资助在起作用。这当中有美国归还庚款的延续，也有各国的跟进。其中差异很大，可是但凡使用庚款留学的，往往都造就了高水平的人才，那是因为一是选拔很严，二是经费充足。

首先我们看看美国庚款退还的延续。1924年5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把庚款余额全部退还给中国，以作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之用。是年在中国成立了一个拥有中美双方人员董事会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其资金还包含清华基金的所剩余额，故相当充裕。这次基金的使用不像早年全部用来资助学生留学，而是使用于颇为广泛的文教事业中。譬如其中设立的“补助金制度”，资助了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及学者出国深造，如后来成为台湾科学界领军人物的吴大猷，即在1931年获乙类资助赴美留学。更值得注意的是自1932年，国立清华大学受教育部委托主持了三届全国留美公费生考选工作。1936年接续又考选了三次。六届共选出近200名优秀学生送往美国深造。抗战期间，清华大学撤退到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西南联合大学，于1940年和1944年又举办过两次考选。1934年，钱学森考上庚款奖学金。这类考试延续了早期的严格风格，除自然科学外，还包括国文、英文、德文及法文。作为唯一攻读航空的学生被录取后，钱学森花了一年的时间在中国考察航空工业基础设施，到1935年才作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的留美公费生，和另外19名青年一起登上杰克逊总统号邮轮。而杨振宁则是1944年在西南联大考上基金会的公费生。其它榜上有名的这几届留美公费生，许多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和学者，他们在解放前后纷纷回国，

成为中国教育和科学领域的主力，下面将详述。

自从美国退还庚款多余部分给中国，用于派遣留学生赴美留学，中国殷切盼望其它各国都能跟进。但却空等了多年。英国直到1922年才发布退款宣言，其中风波不断，主要是存在对如何使用和管理庚款的分歧。蔡元培1924年9月曾经到英国做了十天访问，遍访媒体，拜见关键人士，对促成和落实庚款退还起了重要作用。1926年英国国会通过了《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并明确退款将用于教育项目及派遣留学生，并成立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自1933年至1945年(1940年至1944年停了5年)，前后共举办了9届考选，共录取193人。留英庚款考试的严格程度超过留美庚款考试。对考生要求除了大学专门学校毕业以外，还必须做过两年工作或研究。而所考科目除了国文、英文外，还有占60%的专业科目及占5%的专业著作。那是考研究生水平。事实上，考生确实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群学生，后来又都成了中国各学科的领军人物，文科如钱钟书，理科如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我们在此不妨看一看“三钱”中的另一钱——钱伟长。钱伟长是1939年第七届中英庚款被录取的22人之一，1940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流体力学。之所以到加拿大而不是前往英国，是因为当时二战正酣，英国频遭轰炸，政府为了保护知识精英，将很多大学教授及科学家送到加拿大，钱伟长在多伦多大学师从英国教授获硕士学位，写了一篇受到爱因斯坦赞赏的论文，一年后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成了冯·卡门的弟子。

法国从中国留法勤工俭学时代开办了里昂中法大学，直到1926年，才正式启动用庚款为该大学补助费。不过这所学校只是一个提供住宿及联络的地方，并非正规大学，学生都在附近其它大学学习。中法基金会仿效英美也举办过庚款留学考试，遗憾的是，在1937年办了一次后，即因二战而停顿了下来。不过这一届考生中，却也出了一个后来广为人知的科学家和两弹功臣，即“三钱”中的另一位——钱三强。1937年中法庚款基金会考选中有三个特殊科目名额：镭学、流体力学和微生物学。钱三强考上了镭学名额，进到巴黎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实验室，以后在那里做出了引人注目的科学成果。

比利时所持庚款金额少，他们将退款直接投入使用，而不像他国一样仅用利息，比国退还了半数庚款给中国。中比庚款委员会在1929年至1934年，招考了五次留比学生，共74名。其中出现了一些名人，如生物学家童第周、画家吴作人。

其它国家的庚款退还都不尽人意。特别是日本，根本没有将庚款退还给中国，而当初获赔金额最多的俄国（占总额28.97%），不像其它国家缓付五年，因此他

们早早就掠夺了大量中国财富，后来即使苏维埃掌权，宣布放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可是早期已经获得的金额，仍然为各国所获之最。德国获赔属第二（20.02%），好在一次大战以战败国而终止了这项赔款。总之，我们看到，用屈辱条约的赔款为代价，中国在那个年代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各类留学生。他们毕竟还是用中国人民自己的血汗浇灌出来的，他们也没有忘记养育他们的祖国和人民。这些历届留学生，大多数都在学成后归国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我们以“三钱”为例，钱伟长 1946 年回国，钱三强 1948 年回国，而钱学森因为美国的阻扰，直到 1955 年方才回国，相比李四光第一次留日回归是 1910 年，第二次留英回归是 1920 年，和“三钱”回归前后相差 20—40 年。所以我们不能随意把他们归于同代留学生，只不过他们都是在五十至七十年代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做过贡献的知名科学家。

我们不妨再以两弹研制为例，来看回归留学生对新中国建设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早在 1955 年，为了不再被人欺辱，中国政府奋发图强，决定研制核武器。初始是依赖苏联专家及跟随他们的一群年轻人——自己培养的“又红又专”可信赖的人。后来中苏交恶，苏联专家撤回回国，中国政府被迫启用初始不被信任的从西方留学归国的老科学家们。这些人不负众望，和从苏联回来的一批年轻人，及国内的科学家及工程师们一起，完成了研制原子弹及氢弹的艰巨任务。在这些领军的科学家中，我们要指出的是，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人物——

负责统筹核武器研制任务全局组织工作的钱三强——1937 年法国庚款留学生，1948 年归国，是著名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学生；

负责理论工作的彭桓武——1938 年第六届英国庚款留学生，1947 年归国，是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斯·玻恩的学生；

负责实验工作的王淦昌——1930 年获江苏官费留学德国，1934 年归国，是开辟了原子能时代的“核裂变”现象发现人丽丝·迈特纳的学生；

负责工程的郭永怀——1939 年获英国庚款留学加拿大，后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成了航空航天元老冯·卡门的弟子，1956 年归国。

由此可见，我们的核功臣们，分别是由美、英、法、德最杰出的科学家培养出来的。

自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除了上面提及庚款留学外，政府公费生及自费生也有相当数量。这个期间，中国出国留学学生总数达三万之众。早年留学人员中学人文学科的占较大比例；1928 年教育部公布组织法提出：

“严限选派资格，注重应用科学，以为造就专门技术人才。”此后学习自然科学的人逐渐增加。留学生大多学成即回国。以解放后为例，1949年至1955年11月底，从西方回国的留学生有1536人，其中1076人由政府分配了工作。中国科学院1950年建立第一批研究所时，仅有291名科研人员，其中，有129位（105位属高级研究人员）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科学家，他们都成了重要的学科带头人。1955年全院副研究员及研究员中，70%以上是归国留学生。1955年选出的中国科学院第一届学部委员（后称院士），归国留学生占91%，1980年第四届学部委员中的归国留学生比例仍然高达82%。

那个时代在海外的留学生群体相当可观。1956年一个争取留学生归国文件指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大约有7000人，他们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具有专门知识。不少人已经是科学家和高级技术人员，争取他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目前有重要意义。因为，中国科学院现有的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科学人员只有401人，全国高等学校中，副教授以上的教师也只有7000人。很显然，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7000名左右的留学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很大后备力量，必须大力争取他们回国参加建设。”当时提出“普遍争取而又以美国的留学生为重点”，要求“三年内把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可以回国的留学生基本上争取回国”，而1956年的计划是争取回归一千人。据悉1954年4月底，在美国持有学生护照的中国留学生达5242人；而1956年3月全国进行留学生家属登记时，海外留学生共达6832人。

那么当时海外留学生又是如何看待归国一事呢？我仅以当年纽约留学生办的一份刊物《留美学生通讯》来解读，那是一份简陋的手刻油印小报。在第3卷第5期（1950年2月4日出版）上写着“现在大多数的同学都愿意回国，但是还有些同学在犹豫迟疑，所以‘回国’问题是我们最近谈话的中心……”

那么是些什么问题令一些同学犹豫迟疑呢？在第3卷第7期（1950年3月4日）中列举了12个问题，诸如“新中国究竟走到是哪一条路？有没有言论集会等自由？我们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地位怎样……会不会像国民党一样腐败起来？”与此同时，也有另一些人却下定决心，并且带着极大热情号召大家尽快回去，就在下一期第3卷第8期的《留美学生通讯》上，登载了朱光亚等52位留学生写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1950年3月18日）。信中热情地呼吁“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迫切地需要我们……同学们，祖国父老对我们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的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



图2. 朱光亚等52位留学生写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信”

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做什么呢……我们该赶快回去了。”后面有 52 人的签名。

他们中又有多少人回去了呢？前面提及，

1949 年至 1955 年底，从西方回去了 1536 人，政府 1956 年正殷切盼望余下的那 7000 学子尽快归国。据一份总结报告所说，1955 年 12 月至 1956 年 10 月 22 日，总共回国的只有 158 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有 102 人。事实上，这一百多人中，许多后来都担任了科学院各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因为他们已经在国外工作有年，除了学问，还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无论如何，回来了 158 人，与政府盼望的七千人，与原计划该年度“争取一千人”相去甚远。究其原因，尽管周恩来总理对归国留学生有内部指示：“三年不批，五年不斗，来去自由”。但在具体执行时，遵照的很少；而且这个指示本身也反映出留学生命运多舛。特别是第二年又发动以整肃知识分子为主的反右运动，其结果是，文革前 17 年中回归的留学生，93% 是 1957 年前回去的。当然留学生大量滞留在美国，和美国改变移民政策，对留学生网开一面也不无关系。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这批未归留学生，和后来从台湾赴美留学未归留学生汇合成一支美籍华裔学术大军，正是他们，改变了百年来华人在美国的地位，也为后来台湾经济起飞、政治民主化；以及对本土与西方隔绝 20 多年后的学术沟通，起了特殊的、不可取代的作用，这将在下面详述。

七 早期留苏及五十年代大规模留苏热潮

俄国是我们近邻，历史上也曾是恶邻。早在 17 世纪，莫斯科就有街道纵横、商店林立的中国城，可是 18 世纪的一场反华浪潮，毁灭了人们几十年的辛劳和百年夙愿。以后留在那里的华人越来越少；当然也包括留学生。

后来留学俄国及苏联可按照时代划分为四个阶段：

(1) 帝俄时代。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都派遣过留俄学生。不过他们人数少，没有发出多少声音来。

(2) 十月革命后。莫斯科成立了国际大学东方部，也称东方大学。这些学校

专门以培养国际共运干部为目的。1921年春,中共上海小组主办的外语学社,秘密派送过一批学生赴俄,入读东方大学的“中国班”。他们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总共三、四十人。他们被称为中共第一代留俄生。瞿秋白在该校任教。这个时期的留俄学生中,也有一些是从法国转来的,他们当初以勤工俭学目的去法国,正值一战后法国经济衰退,无工可做,这些怀抱改造中国的青年,横穿欧洲来到莫斯科,进入了东方大学,和从国内来的人汇合了。他们中有邓小平、朱德等。他们大多数在1923年左右回国,担当了早期的中共领导工作。

(3) 国共合作后。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苏联利用庚款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又称孙逸仙劳动大学),招收国内大学二年级以上同等学历、但需有国民党党籍者。当时仅在广州就录取了250人。蒋经国、张闻天、王稼祥、陈绍禹、秦邦宪、陈昌浩、康生及伍修权都是这期的留俄学生。他们在苏联逗留的时间比第一批去的人要长久,从2至6年不等。中山大学前后招过三期,包括叶剑英、杨尚昆、左权、乌兰夫、帅孟奇及陈伯达等人。他们被称为中共第二代留俄生。1927年后,国民党学生被送回国。中山大学于1930年关闭,董必武、林伯渠等人被送到列宁学院。无论是东方大学还是中山大学,都培养了大批共产党干部。

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接待过一个美国考察团,中山大学校长卡尔·拉迪克(Karl Radek)问来访的美国团长,“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共有多少?”美国团长回答:“约有六千人。”拉迪克回应道:“在俄国中山大学的留学生虽然只有六百人,但是你要知道,美国之中国留学生毕业回国,只从事教书或事业方面的工作,而我们俄国之中国留学生六百人,毕业回国是要领导中国的政治。”

君不见六十年代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刘少奇和蒋经国,都是这个时期的留俄生!正中了拉迪克当年的预言。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留学对中国政治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中共一大至十四大政治局委员(一大至四大为中央局)中留学生的比例,从最低的十三大(20%)至最高的八大(83%),另外四大和七大留学生也占80%的高比例。

(4) 五十年代的大规模留苏。早在解放战争正酣的1948年,中国共产党就曾派送过一批烈士及干部子弟赴苏留学,其中就包括李鹏、刘允若等。而大规模地留苏,则发生在五十年代。我们注意到,公开提出现代化口号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我们把它称为现代化的第五个阶段。现代化急需人才。中国政府一是盼望身在西方的海外学人尽早回国;二是向当时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苏联及东欧诸国派出大批留学生。1950年到1965年间,中国向苏联、东欧及少数西方国家

派送了1.6万多名留学生。其中92%派往苏联,多数学理工;大多数是大学生,仅有少数是研究生和进修生。这些学生初期是从大学低年级中选拔,以后是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会试,与历史上历次考选留学生不同的是增加了政治审核。北京专门设立了作为留苏预备部的俄语专科学校(俄专)。1955年留苏鼎盛时期,俄专多达2000学生。在1956年中国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后,大批留苏学生受命从常规学科转到各个新科学、新技术领域,他们回来后多数成为该领域的业务骨干。我们也注意到,近一、二十年中,许多国家及各行各业的领导人都有留苏背景。其实这是年龄断层和留学政策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个阶段没有多少留学生从西方回来,而中国那个阶段又无法像以前那样向西方诸国派遣留学生,留苏及留东欧几乎成了唯一的深造途径,那个时期从苏联及东欧归国的留学生,在同龄人中就有了留学经历和更强的学术背景。他们大多数不过是本科毕业,少数拥有副博士学位。六十年代中苏交恶,留苏学生锐减。归国留苏生的重用也多少受到影响,这是始料不及的历史遗憾。

八 台湾学人大规模留美及美籍华裔学者的独特作用

20世纪从50年代至70年代,台湾有大批留学生来到美国求学。究其原因,实因高等教育资源在台湾有限,而美国对台湾又网开一面,逐渐形成了台湾学生大批留学美国。台湾当局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曾八次修订留学规程。自1953年开始举办大专毕业生留学考试,至1975年,23年中,总共录取自费和奖学金留学生25,398人,其中以自费生为主。另外从1950年至1955年,还录取了835名高中毕业生留美,这些学生必须获有国外大学四年全部奖学金才允许参加考试。仅看1950年至1955年远东各国家和地区留学生数字,台湾就已经遥遥领先于印度、日本和韩国;其后有增无减。台湾在1955年至1977年,共举办过19次公费留学考试,共录取了261名,主要是赴美,也有赴英、德、法、日、加拿大、土耳其、黎巴嫩及泰国等国的。与此同时,台湾先后派出过上千位专科以上教师出境进修,相当于我们的访问学者,他们的回归率高达90%以上,只是人数相对自费留学生显得太少。

1962年,台湾留学政策有了重大改变——凡自费及有奖学金者,一律免试出国;自此留学大门洞开,留学人数大增。自1950年至1976年,26年间,台湾留学总人数高达42,719人,确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四十年代在美国

获取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中,文科占32.2%;而到六十年代,学自然科学的已经占到85%。就在那时,中国留学生人数在美国已经占外国学生的第二位。

令人瞩目的是此时出现了一个中国留学运动中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他们中高达80%的人学成未归。这里涉及到台湾的发展天地毕竟不够广阔,而且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在大陆出生,甚至在那里完成了初级教育,台湾作为必归家园的意识并非那么强烈;而中国社会制度多变,使许多留学生举棋不定;加上美国五十年代出现的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许多人从安全感出发,加入了美籍,成了美籍华人、新大陆的新移民。这群人开始步入美国主流社会,包括教育及科研机构,在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美籍华裔的学院院长、系主任、教授;在研究机构大楼里出现华人专家和工程师。美国著名计算机公司IBM中华裔占研究人员的六分之一。贝尔实验室也有60多位华人。硅谷的华人更是计其数,在此不一一赘述。

我们关注的是,这个群体和早年华人群体究竟有何不同?又为何会出现这些不同?追溯历史,早在1849年,就有36个中国人来到旧金山;1872年容闳带领了120个幼童留美,成为昙花一现。1882年《排华法》出笼之前,中国人是可以自由移民美国的。仅在旧金山地区,19世纪末中国移民就有一万四千余人。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是谁人呢?他们没有留下什么声音,他们对开发美国西部,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可是在文化上,他们从来没有融入,甚至还十分反感美国文化。也鲜少有人向国人介绍美国文化,因为他们大多数是劳工,对本国文化掌握有限,来到异国他乡,整个移民群体和周围格格不入,文化隔阂更像是座高大的围栏,把自己封闭在唐人街的狭小圈子里,和其它族裔比较,他们是最少吸收美国文化的一族人;而美国文化恰恰是强调“文化熔炉”。

这个现象终于在百年后有了改变。20世纪中叶那群滞留未归的中国留学生,是受过高等教育、事业有成的群体,如今多数加入了美籍,成为美籍华人。这些人中的少数,属于二战前后由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的人,也就是前面我们提及的,1956年在美留学生中滞留未归的那五千多人,如今他们已经在美国落脚生存下来了。另一部分则是来自香港及东南亚国家,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来自台湾的留学生。这些新移民不会把自己封闭在中国城,他们掉在美国熔炉里,面临一种选择,就是必须摒弃那些与美国精神不兼容的传统文化带来的糟粕,以应对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和他们的移民前辈相比,有成就的已不是个别范例,而是成群的出现,这就不能仅仅归功于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而必须看到从他们的创造精神的焕发,到孜孜不倦地奋勇进取,都说明他们已经相当全面地接受了移民

国家——美国的文化价值。不管他们自己愿意或喜欢与否，这就是现实。而这种融合表现的是人类智慧与道德的汇合与提炼，应该看作是人类的一种进步，无须有任何失落或自卑。

我们注意到，80% 台湾留学生学成未归，并没有影响台湾的经济起飞；相反，他们对台湾经济走向世界起着某种独特的作用，可以称之为特殊的信息源、联络网及咨询人。后来台湾学人回归的比例逐年增加，这种被称为人才回流的现象，在韩国、新加坡等地也可见到；当然日本是个特例，他们留学生很少不归。这说明只要国家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留学生回归是可能的和必然的，毋须特别的政策召唤。

我们不得不提到的是，到了七十年代，这个特殊美籍华裔学人群体，对大洋彼岸的故国，竟然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那是由于自从五十年代中美关系破裂，两国间的科技文化交流自然中止了。文革开始后，中国与国际的许多正常交流更是停顿了。不过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长期被忽略的现象终归引起了关注，特别是中美乒乓球队的意外接触，触动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

1971 年 2 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意外地接到一封来自瑞典的信。那封信来自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拉德伯格，更不可思议的是，信中竟然夹着一封美国科学院给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信。两封信的中心议题是共同的：美国科学院希望通过与中国保持良好外交关系的瑞典皇家科学院，来改善与中国，特别是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美国科学院执行秘书杜德在信中写道：“两国的学术界有着合作的长久历史，并且有着共同的兴趣。尽管过去几年中有着各种阻碍，但是，重要的是他们应寻求恢复这种历史友谊的方法。”

方法不难寻求，重要的是时机。就中美僵化已久的关系正处于松动的微妙关头；在此若明若暗、扑朔迷离的时刻，有人敏锐地洞察了这种可能发展的前景，并且大胆地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那就是 1971 年 7 月 20 日杨振宁的首次访华。

杨振宁此时已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5 年，名满天下。他的研究风格——创造性和开拓性在他首次访华也表露无遗。他冒着当时在政治上、各种舆论歧见上的风险和多方的阻力，毅然辞去 IBM 公司顾问之职，从巴黎中国大使馆取得签证，怀着渴望与探求的心情，踏上了阔别 26 年的中国土地，成为美籍华裔知名学者访华第一人。难能可贵的是，在他决定访华之时，曾受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科学顾问戴维之托，以私人身份探询中美两国科学院直接进行有效接触的可能性以及接触方式。杨振宁在京转达了这个意愿，鉴于当时两国尚未正式建交，中国认为两

国科学院接触为时过早，但是愿意考虑美国科学家的个人访华。

杨振宁回到美国后在其任教的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做了演讲，这次犹如投石试水的演讲，激起了巨大涟漪。无数电话打来，有陈省身、林家翘、任之恭……1972年春，尼克松总统访华，签订了《上海公报》。同年6月，任之恭为团长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平均年龄55岁）来到中国，除了拜访亲友，每个人都在相关的研究所做了学术报告。1972年9月，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访华，他在访问中表示出对基础研究及培养人才的关注，特别提出要从十二、三岁就挑选人才进行培养。1975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讨论了少年大学生问题，1978年，该校出现了“少年班”，并逐渐推广到若干院校。同年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访华，他带来了一封美中科学交流委员会的信，邀请中国科学家访问美国。这封信经这位昔日中央研究院院士、今日美国科学院院士之手，完成了在官方道路尚不通畅、民间迫切希望沟通的时代的信息传递，也是早年留学生、如今美籍华裔学者在学术成就之外的又一贡献。

1975年11月，一位著名实验物理学家访问中国，他是丁肇中。在那些年里，来访的各类美籍华裔学者代表团，如过江之鲫。老一辈的、台湾从来没有踏上过大陆的、还有一些美国出生的年轻一代华人学者都组成各类代表团访华。有些学者还在中国做了短暂的学术逗留，中国学者此时也开始被邀请到美国访问。1977年8月，丁肇中第二次访华时，他已是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美籍华裔学者了。当邓小平接见他时，他表示“要为国内科学技术发展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次会晤确定在德国汉堡丁肇中实验组为中国培养十个人。邓小平随后还表示：“各行各业都可以派留学生”。自1978年起，中国开始有计划地向世界许多国家派遣访问学者和研究生。中国在“请进来”的政策同时，1978年“派出去”也在逐年扩大。

回顾这段历史，难免会想到留学生的开山鼻祖容闳。百年前他在耶鲁大学毕业时，想的是“我所受的教育权利，下一代的同胞也应该同样享受”。今天，从耶鲁、哈佛、普林斯顿、哥伦比亚毕业的成百上千的中国留学生，尽管和他们先辈容闳一样，即使拥有了美国国籍，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战友、自己出生的土地。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亲情所致。当他们成了一个美国人，他们骨子里还是个中国人，不管他们为此感到骄傲还是烦恼，一根精神上的、感情里的，看不见却又剪不断的生命之线把他们和那个赋予他们躯体与灵魂的土地和人民紧紧相连；一种内在的沟通愿望本能地潜伏在每个人的心中。这批特殊的在西方生活过多年的留

学生们，早已在新与旧、中与西的困惑中数遭锤炼，在传统文化与西方价值间几经选择。他们是过来人，是知情者，对如何由中国文化熏陶的传统人过度到工业化社会的现代人，他们有过痛苦的经历和深刻体会，对于正在向现代化过渡的中国和中国人民，也许应该把这群人看作是宝贵的资源和无形财富。随着中国自己派出越来越多的留学生，而他们中归国的和留下的数字也在一天天升高时，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那批当年回国的美籍华裔学者的延续，他们都在起着传播近代科学技术及一切有益知识的可贵作用，他们都是留学史值得书写的一章。

九 改革开放后留学热潮再起

十年文革，十二年停止高考，中国面临人才断层、师资不继的窘况。1977年恢复高考，给千百万年轻一代带来喜悦和希望。而尽管历代归国留学生在十年文革中吃尽苦头，可是此时此刻，人们仍然向往留学。一是国内教育一时难以满足众多求学饥渴十年的莘莘学子；二是十年隔阂，人们迫切想到外面世界一窥其境。1978年丁肇中带回的十个高材生只是引路之石，随后掀起了波涛汹涌的留学潮。五十年前留法归来的老留学生邓小平是年5月23日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要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教育部闻风而动，7月11日即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的报告》，提出立即选拔三千人出国留学；8月，国务院批准了该报告。随之全国考选又一次出现，让人想起1908年首次庚款考选及后来的无数次会考，不过这次考试仅仅考了英文；而且走进考场的人，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了。

1978年12月，52个被选中的人，从北京经过巴黎，向美国纽约飞去。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一个世纪前的1872年，30个穿着一色长袍马褂、脑后拖着一根长辫的十多岁少年，乘坐老式海轮，惊恐不安地横跨太平洋抵达旧金山；而今52个穿着一色定制西装的中年人，同样是惊恐不安地横跨欧亚两大洲及大西洋，乘坐新式飞机来到美国。他们这次的惊恐不安，不是因为明轮船那两个飞旋的轮子掀起滔天巨浪，而是因为他们奔赴的目的地是在他们成长的30年里一直遭到批判的头号敌人美帝，更可怕的是，当他们抵达中途站巴黎时，还获知了纽约机场已经有大批等候着采访他们的各电台报社记者。20世纪开启封闭大门的首批出洋留学者，在纽约机场大厅里，在几十个西方记者的镁光灯下，他们的代表认真地念了准备好的稿子；走出机场后，他们分别奔向几十所著名大学——他们老师辈

曾经苦读过的校园。

我们注意到,1978年中美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当年选拔了四千多预备留学生,而所去国仍以美国为主要目的地。那是因为当年10月,以周培源为首的中国教育代表团正在美国访问,他们代表中方与美方达成了“口头谅解”,明确美方1978年至1979年将接受中方500至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及访问学者),中方接受60名美国留学生及访问学者。1979年1月,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该项口头谅解终化作正式协议;从此之后,中国赴美留学生工作步入正规且规模逐年扩大。

初始时派出的多是四十岁左右的访问学者,但是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都心知肚明:我们需要培养新一代研究生,庚款留美及以后延续的留学传统都说明,最值得投资的应该是研究生。可是研究生几年费用可观,这是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就在此时刻,一位传奇性的女学者展现了非凡的眼力和勇气,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她是李佩,探询的是自费留学可行途径。1979年10月,李佩先生执教的中科院研究生院聘请的美国教员玛丽(Mary Van de Water)向李先生建议:“中国学生不必等待所属单位选拔公派留学,可以直接向美国大学写信申请助学金。”李佩先生意识到封闭的大门在眼前开启了一道门缝,立即向研究生院领导彭平汇报。所幸彭平没有阻扰,他说:“我已经老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了,你们就这么办吧!”几百名研究生在李佩先生推动下开始写申请书。当时还不敢在北京发信,玛丽自掏腰包,专程跑到深圳去寄出这几百封申请信。数月后,近百名研究生收到回信,他们都获得申请学校的助学金。而研究生院竟没有加以阻拦,美国大使馆更是大开绿灯——这上百个人没有一个被拒签。不出一年,这些研究生都飘洋过海到了彼岸,他们的数量相当于政府一年派出研究生的总和。此风后来传到北大、清华,再传到上海。此时科学院的这批先行者,已经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开始做博士后了。

李佩此举在当代中国留学史上,功不可没!因为它为无门路的广大青年开辟了前往国外留学深造的一条新路。我们注意到这些自费生与历史上的自费生不同,而美国大学提供的是助学金也与以往庚款留学生所获奖学金不同:

(1) 这些自费生不是历史上以前和以后有过的许多富家子弟,靠家庭提供留学费用的那类自费生。说他们是自费生实为区别于“公费生”——靠政府资助的那些留学生。实际上他们的留学经费既不是靠自己家庭,也不是靠政府,而是靠所去留学国家的学校提供。学校允许他们免交学费,并提供一定数额的每

月生活费；

(2) 他们拿的是助学金，即他们要充当指导教授的助教(AT)或助研(RT)，以换得免交学费和每月一定数额的生活费以维生；说来具有半工半读的性质，不过所作工作，无论是助教还是助研，都和自己专业相关。特别是助研，充当指导教授的助手时，会继续获得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后来的不少研究成果，也是学生和教授的合作结晶。而早期庚款留学生拿到是奖学金，也就是不必作工每月就可以获得相当丰厚的津贴，这对他们全力以赴求学更有帮助，这也是那批庚款生个个杰出的原因之一。不过美国大学提供的助学金仍然高于国内官费生。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例，公费生每月 400 美元，美国大学助学金每月 1000 美元。

1981 年，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等单位的《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指示》及《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明确自费与公费一视同仁，国内也开始举办托福考试。1979 至 1984 年，11000 多人自费出国留学；1984 年，中办文件指出对自费留学要“坚决、大胆、放开”；1985 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留学大门对大众敞开了。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之需，是广大青年求知欲所向。遗憾的是次年，1986 年 12 月 13 日，教委的一个暂行规定，提出公费留学人员出国前，需与选派单位签订“出国留学协议书”，包括留学目标、内容、期限、回国服务要求以及双方其它权利、义务和责任等等。1987 年 11 月 28 日，对自费公派（也称单位公派）做出若干新规定，要求在职、在学人员未经批准不得自行联系国内外奖学金、贷学金等资助，还制定了“单位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登记表”（简称 JW102），自此，靠国外助学金资助的留学人数大幅度下降。留学政策的反复变化，及自费留学生的增加，使得学成归国的比例下降，到九十年代初，更是达到不归率的高峰，这个现象和五十年代初十分相仿。九十年代七万留学生滞留美国，恰是四十年前的十倍；当然这里也有和五十年代类似的美国改变移民政策，为不归留学生打开方便之门之故。此后中国当局重新考虑了留学政策，1993 年，新的留学政策——“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被写进了十四届三中全会。留学热开始回潮。

十 新时代的留学潮流和展望

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到新世纪里，各类留学生络绎不绝，自改革开放至 2014 年底，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高达 350 万。回归留学生也在不断增长，特别是近五

年中,竟高达80万;尤以2012年为最,仅这一年里回归的留学生就有27万多人。

到了21世纪,留学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留学不仅仅是为了到先进国家去受知识教育,同时也是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和更多了解国际规则、语言和社会的途径。如果我们观察新世纪新的留学潮,会发现它和以前历次留学潮明显不同,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 留学生低龄化,小学生、中学生出国成为普遍现象。2006年赴美读中学的只有65人,到2011年,已高达6725人,五年增长一百倍。我们记得第一次留学潮就是幼童留美,但是目前的低龄化和19世纪幼童留美又有很大不同。那次学生确实是低龄化——最小的仅9岁,最大也只有16岁,也是小学生、中学生出国。不过按照协议他们被分配住在美国人家中,房东同时也是他们的监护人——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些美国人不仅要照顾中国小留学生的生活(管吃管住,管送学校上学),还要在德育上对他们有所管教和在体育上对他们有所要求。甚至按照清廷政府要求,还督促他们复习中文和定期去幼童出洋肄业局读古文。也就是说,这群小留学生不是放任自流的,是有专人管束的。所以在美国留学九年中,没有听说哪个留美幼童变坏或行为不端,而是赞扬之词层出不穷。

(2) 自费出国留学普遍。这次是实实在在由留学生家长自掏腰包送孩子到国外读书。这种现象历史上有过,但绝没有这么多和这么普遍。从读小学、语言学校,到读中学、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学位都有。这里有家境好、有条件的,也有工薪阶层倾家荡产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后者被人称之为杀了“母鸡”送子留学。如果孩子真的学好,学的专业也适合,也许还可以求得回报;可惜许多家庭是杀了母鸡也丢了蛋。一旦留学沦为一种风气、一种时尚、一种争面子、彼此攀比的装饰性的风潮,就失去了原本留学是去教育程度更好的国家求得一技之长和增长见识的初衷了。近年来得不偿失的例子频频出现。

(3) 选择求学的学校不再是他们先辈要求的最好的学校了,各类学校都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甚至出现美国野鸡大学的多数学生来自中国的可悲现象。留学变成出国而出国,变成只为镀金。几十万留学大军中又有多少人可以和他们的先辈相比,会达到他们家长和国家的期盼呢?我们希望尽量的一些,但是在质量差的学校即使拿到文凭,那也是缩水的,不足为傲。

(4) 留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好的永远会有。他们继承了留学先辈的勤劳和刻苦,真正珍惜留学岁月,不虚度自己青春年华,用自己的辛劳加上一流大学的丰富资源,学到了真本事,具备了真学问。他们将是中国的希望,国家的栋梁,也

是第十次留学潮中的佼佼者。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当年留美幼童那套完整的监护人制度,还有一些不能自控的留学生处在放任自流的状态。他们既不在乎父母的期望,也不可惜父母为供养他们而支付的高昂留学费用,更加不珍惜自己大好年华似水流去。在部分只求收到高昂学费,对学生没有严格要求,宽进宽出的学校,他们还可以混下去。一旦进入的是正规一些、传统一些的学校,那些不努力学习,功课跟不上的也就只有被淘汰了。2013—2014年度,有27万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就读,2015年全美盛传数千名中国学生被开除,其中多半是因学业跟不上。这当中既有一些当初来就读时所递交的材料就有水分,或者说,他们来时就不够格;另一些人是以为这里大学可以随便应付,掉以轻心的结果是被淘汰出局。另据报导有十五位中国留学生被逮捕,那是因为作弊(特别是考托福或GRE雇用枪手)、剽窃等行为触犯了美国法律。有的人由于学校发现推荐信作假,被著名大学通知“终身不得录取”。这一切都使留学质量遭到质疑,尽管这种现象不是十分普遍,但也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警惕。

(5) 公费留学不断扩大。国家留学基金委每年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深造,2014年已达1996年的12倍。该基金不仅资助出国留学,同时也资助来华留学的外国学生和学者,使得双向留学成真。

(6) 留学生归国率不断回升。2013年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留学归国率已高达72.83%。这是这些年国家经济蓬勃发展,留学生政策宽松的必然结果。新世纪的归国留学生,正逢中国现代化全力猛进的时代。他们的归来,带来了新气象,开创了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理念,另外他们也带来了新技术和新的时代气息。他们不仅像老一辈留学生一样,在教育、科技上做出杰出贡献,还普遍走进了政界、商界和各行各业。相信新一代留学生也会和历次留学潮的前辈一样,在把中国推向科学昌盛、文化繁荣和社会开明的道路上,发挥更多的创造性。

纵览中国近一个半世纪的十次留学潮,它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中国人努力摆脱愚昧、落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息息相关。一百多年的留学史,也是一百多年民族奋斗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留学生如同在丰富的营养液里浸润已久的种子,他们需要肥沃的土壤、充足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才能发芽、开花和结果。只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开放并有弹性的社会,留学生的回归是必然的。愿第十次留学潮能够继续发扬其光辉和灿烂的一面,让后人在回顾我们这个时代时,也为这代留学生感到骄傲。

参考文献

- 超然. 中国科学发达史资料 [J]. 学术. 1940.
- 陈三井编. 勤工俭学运动 [M]. 台北: 正中书局. 1981.
- 陈周棠主编. 中国近代史 [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3.
- 段宏俊编. 留学生与留学问题 [M]. 台北: 益世书局. 1975.
- 方豪. 方豪六十自定稿 [M].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69.
- 高宗鲁编注. 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 [M].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5.
- 高宗鲁译注. 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 [M]. 台北: 华欣文化事业中心. 1982.
- 郭秉文. 五十年来中国之高等教育 [J]. 教育与人生. 1923(5).
- 国务院批转国家教育委员会. 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 [J]. 神州学人. 1987. (2).
- 黄润龙编. 海外移民和美籍华人 [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李鸿章. 李文忠公全集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1.
- 李书华. 碣庐集 [M]. 台北: 传记文学丛书. 1967.
- 林子勋. 中国留学教育史 (一八四七至一九七五) [M]. 台北: 华岗出版有限公司. 1976.
- 卢于道. 三十年来我国之科学的进展 [J]. 民主与科学. 1945. (1).
- 卢于道. 我国科学之回顾 [J]. 文化先锋. 1944. (1).
- 马骊编 (莫旭强译). 一战华工在法国 [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15.
- 木宫彦泰. 中日交通史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2.
-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 清华大学校史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数据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79.
- 瞿立鹤. 清末留学教育 [M]. 台北: 三民书局. 1973.
- 容闳. 西学东渐记 [M]. 钟叔河主编.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 实藤惠秀.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M]. 香港: 三联书店. 1982.
- 史密斯. 今日的美国与中国 [M]. 纽约. 1907.
- 舒新城. 中国近代留学史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
-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1901 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3.
- 王焕深. 留学教育 [M]. 台北: 国立编译公司. 1980.
- 王树槐. 庚子赔款. 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C]. 台北: 中央研究院. 1974.
- 吴家熙. 挽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科学教育 [J]. 教育建设. 1942.
- 武安隆编. 迁唐史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 萧超然等. 北京大学校史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
- 徐行. 留学生与中共之渊源及对中共的深远影响 [J]. 明报月刊. 香港. 1993. (9).
- 薛君度. 黄兴与中国革命 [M]. 香港: 三联书店. 1980.
- 杨家振. 中日友好史话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姚蜀平. 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对现代物理的贡献及其美学社会原因初探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5. (1).
- 姚蜀平. 留学生的回归: 历史之轮回 [J]. 潮流月刊. 1992. (58), (60).
- 姚蜀平. 留学政策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兼评留学政策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8. (6).
- 姚蜀平. 愿天下壮士志终酬 [J]. 潮流月刊. 1988. (22).
- 姚蜀平. 中国留学生与现代化 [J]. 明报月刊. 1993. (9).
- 姚蜀平. 西学东渐的传播者——留学生 [J]. 和平与发展. 1989. (3).
- 颖之. 中国近代留学简史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0.
- 周昌寿. 张菊生先生七十生纪念论文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中国科苑英华录》编写组. 中国科苑英华录——新中国之部 [M].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85, 1988.

Ten Wives of Students Abroad Coincided with China's Entire Modernization Process

YAO Shuping

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first wave of Chinese Youth sent by Government to study in the US in 19th century, and ends with 21st century new age students aboard. The paper covers total ten different waves of study abroad over period of over 140 years that coincided with China's entire modernization process. From mid-nineteen century during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he first official dispatch of US bound Youth students followed closely with Modernization Movement that characterized by the focus on change in goods (economy); In the second wave, study abroad in Europe, the focus shifted from economical to political changes; The third wave of study abroa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befor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een tens of thousands students went to Japan; The fourth wave to the US, result of "the Boxer Indemnity", brought changes in culture; "Work-Study in France" is the fifth wave of study abroad that brought Proletarian Revolution; The sixth wave to Western nations surrounded Sino-Japanese war provided human resource reserve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During the Fifties, Soviet bound from mainland (seventh wave) and US bound from Taiwan (eighth wave) provide manpower needed for modernization driv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The ninth wave of study abroad after "Reform and Open" and the Tenth wave of new century are main force of current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hina, Modernization, Study abroad, Tide of returning, Cultural exchange, Changes



姚蜀平作品

《爱之四季》，姚蜀平著，波士顿双语传媒和出版公司，2015 年。

《他从东方来》，姚蜀平著，金城出版社出版，2014 年。

《悲情大地》，姚蜀平著，香港明镜出版社，2010 年。

《似水流年》，姚蜀平著，花城出版社，2009 年。

姚蜀平为中国科技大学首届毕业生，曾在二机部及科学院工作。1978年，撰写电影剧本《李四光》，八十年代翻译《核临界安全》及撰写《现代化与文化变迁》等书籍。退休后撰写长篇小说《似水流年》（繁体字版《悲情大地》在香港出版）。2011年撰写一战华工的长篇小说《他从东方来》，获第一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2014年出版）。近年还发表中篇小说《魂归故里》、《枫叶参天》、《爱之四季》；短篇小说《天才之死》、散文《儿女祭》等。

ISSN 1672-6804

2015年 第12卷 第2期

定价：15.00元

